

曹溶與浙西詞派之關係重探*

許嘉瑋**

(收稿日期：111年12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112年7月20日)

提要

浙西詞派論詞旨趣向以清空騷雅詞風及取法姜夔、張炎為典範著稱，開山宗主朱彝尊卻將引領此風氣的冠冕給了鄉前輩曹溶，指出康熙詞壇「家白石而戶玉田」的榮景，認為「風氣之變，實由先生」。然則，若從詞體認知、具體批評與創作實踐幾個角度，重新檢視曹溶與浙西詞派的關係，可知二者的差異不小，尤其表現在對「雅」與「南宋詞」的理解上。曹溶重性靈而反對雕琢，對姜、張為首之典雅詞並不特別偏好，反而認為詞體為情感之容器，而人各有性情，無須專尚一家，宜轉益多師。曹溶在朱彝尊習詞初期雖曾發揮影響，但整體來說論詞主張更接近陽羨詞派陳維崧，引領風氣之變，殆源於朱彝尊刻意的推崇與誤讀。

關鍵詞：曹溶、朱彝尊、浙西詞派、詞體認知、詞評與實踐

* 本文蒙渥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康熙十八年後，朱彝尊在詞壇轉移晚明宗尚《花間》、《草堂》之風，試圖擺落俗豔與寄託，朝向重視格調音律、鍛鍊字句等強調詞體形式審美的道路，影響力既深且遠。即使至嘉、道年間，不滿浙派末流空疏堆垛的常州詞派因應晚清變局而重新強調寄託，卻也未曾經忽形式帶來的美感與力量。¹職此，稱浙派為清代詞學風氣轉換之樞紐，當不為過。就歷史現實而言，浙派宗主為朱彝尊顯無疑義，但他在〈靜惕堂詞序〉中卻將開先河之功歸諸啟蒙自身填詞的鄉前輩曹溶，學界對此說之解讀有支持者，亦有反對者。

欲判別詞人與詞派之關係應站在甚麼角度，哪些詞人該列為同一詞派，依照持論差異而有不同。僅依一篇序文提供之線索有多少信度與效度，該如何分辨曹溶在哪些層面影響該詞派的理論與實踐，似乎需要回到更具體的細則進行討論。導夫先路者未必能逕自納入詞派，朱彝尊的認知與說法對應的詞壇環境為何，標榜曹溶對浙西詞派從草創到發揮實際影響力具備甚麼正面效益，都是值得思辨的課題。

學界對此課題曾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而對曹溶是否可作為浙派遠祖，歷來正、反論述皆有，但以支持曹溶開浙派先河的觀點為多。不過開宗派先河與實質影響力的縫隙，理應進一步反思。尤其〈靜惕堂詞序〉是朱彝尊在曹溶辭世後所撰寫的，頗有幾分追認意味。從世故人情的角度，或許對此應稍持保留空間，至少須檢視曹溶自身的詞學觀與這樣的追認之間有多少契合度。

透過朱彝尊標舉曹溶的個案，當能略窺他身為清代前中期影響力最深遠的詞派宗主，對建立、推廣詞派可能的操作策略與用心。藉由朱彝尊對同時期哪些詞人可引為「同道」的判斷，亦足以反向觀察曹溶面對浙派成員的論斷是否符合一般對浙派論述的理解。陳雪軍就曾指出曹、朱二人詞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從尊詞體、求醇雅以及重南宋、宗姜夔兩點進行比較，重要觀點有二：首先、二人皆推崇雅正，但曹氏主張由自然達到雅正，朱氏則透過句琢字練而臻於雅正；其次、二人均推崇南宋而不廢北宋，差別在於曹溶凸顯的

¹ 如常派中堅周濟便曾以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四家為學詞途徑，其中吳、王二人在浙派之地位雖不如姜、張，無疑仍是嫡嗣法乳。被視為集大成的周邦彥，同樣曾被朱彝尊列為宋代浙西詞名家，但並不甚重視，周濟卻以為「勾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勾勒便薄，清真愈勾勒愈渾厚。」見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2版），頁1632。至清末民初詞壇，依舊浸潤常派所論，故有偏重意趣的趨勢，然而晚清四家對吳文英尤為看重，當時對格律與字詞修飾的鑽研，欲扣緊詞體之音樂性和藝術性，可說延續浙派所長。卓清芬以為晚清詞論巧妙融會常、浙的深厚與清空，兼顧命意與運筆兩方面。參卓清芬：《晚清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年），頁43。

是劉、辛一路，朱彝尊卻取法姜、張。陳氏透過上述說法推導出其人搜集南宋遺集與兼學南北宋的行為，確實與以朱彝尊為首之浙派「家白石而戶玉田」有共通處，指出宗南宋、尊姜夔皆源自曹溶，故當視之為此宗風的先驅人物。²然而，和韻史達祖〈萬年歡〉之作是否等同服膺姜史一脈？又何以能看出曹溶對浙派詞論有著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都值得商榷。

本文的思考路徑是先梳理學界對此論題的說法，從中尋繹尚可展開的著力點，其次則分別針對詞體認知、實際批評和創作三個角度，觀察曹溶與朱彝尊之異同，希望能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新盱衡曹溶在浙派成立過程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清初詞壇的位置。職此，在章節安排上也將依此順序進行論述，並提出己見。

二、曹溶為浙派先河之討論

曹溶(1613-1685)為朱彝尊(1629-1709)之鄉先賢，與朱彝尊叔父朱茂暉(1618-1647)為同科進士，且曹溶之子娶朱彝尊同族姪女，二人既為姻親亦屬忘年交，具地緣與親族網絡關係。³由於地域與交遊網絡向來為研究清代詞派的重要參考，故曹溶似乎確實有成為浙派先河的基礎。不過曹、朱詞學活動的接觸，主要肇端自順治十四年(1657)朱彝尊赴粵任廣東布政使曹溶幕客才正式展開，而最常被拈出作為證據的文獻莫過於〈靜惕堂詞序〉一文：

吾鄉倦圃曹先生著述之富，在牧齋、梅邨伯仲間，乃錢、吳專集行世已久，近且墨渝紙敝，獨靜惕堂詩文未之雕刻，豈著述之傳否固有數存焉耶？抑其出也愈後，則其傳之者彌永耶。從孫愷仲崑季取所填詞先付梨棗。彝尊憶壯日從先生南遊嶺表，西北至雲中，酒闌燈地，往往以小令慢詞更迭倡和。有井水處，輒為銀箏檀板所歌。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禩，詞學失傳，先生搜輯南宋遺集，尊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春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先生。當世君子得先生

² 此歸納陳雪軍所論，詳參陳雪軍：《梅里詞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20-134。文中以梅里詞派為浙西之先驅，尤其多次明確指出曹溶對此一詞派宗風的影響與共通處，分見頁120、129、131、134。

³ 曹溶與朱彝尊的姻親關係與交往契機之背景，此參考曹秀蘭：《曹溶詞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81-184。

詞誦之，必有思雕先生之詩文者。先生之著作雖出之晚，庶幾傳之彌永焉。同郡年家子朱彝尊序。⁴

朱彝尊並未明確指出浙派對姜夔、張炎의 推崇直接受到曹溶影響，然而將「春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先生」一語置諸「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之後，略顯順理成章，也容易造成誤會。因為這句話只能看出曹溶確實曾影響朱彝尊與當時的詞壇風氣，但放回詞學史與學術史的脈絡，顯然無法推論出曹溶之說啟迪浙派觀點，更遑論直接判定曹溶確實為浙派先河。

蓋以序文對曹溶與浙派關係的說法略顯曖昧，後代學者對這段文獻解讀也頗見分歧。持反對意見者如嚴迪昌、李康化等。嚴氏稱曹溶雖為朱彝尊之詞學啟蒙，真正有影響的階段卻在《江湖載酒集》時期，不宜據此逆向推斷曹詞趨近白石、玉田風調。此外，曹溶雖為《詞綜》之編纂提供豐富的資料，然與浙西成派並無直接關聯，所謂先河實帶有「追贈」意味；李氏更直指顧貞觀對自然的追求乃受曹溶影響，而顧貞觀與朱彝尊對詞體的認知有異，足以證明曹、朱二人之詞學觀有根本差異——若就模習典範而論，前者反對南宋以雕琢為工的習氣，後者肯認詞至南宋極其工，故判斷影響、轉移當時風氣，實屬失當的追認。

5

劉萱亦認為曹溶非浙派先河，並從詞風、詞學觀以及浙派成員的交遊三點出發，指出彼此差異如下：一法稼軒，一法姜張；一重北宋黜南宋，一獨尊南宋；曹氏雖與浙派詞人多所往來，但只是關照後輩，非如朱彝尊所言發揮深遠重大的影響。最後結論判定朱彝尊稱曹溶詞為姜張一路，乃為符合清廷統治需求，掩飾曹溶抑鬱牢騷的面目，藉以保護他免受罷黜。然而，曹溶若重北宋而黜南宋，該如何解釋取法稼軒？曹氏與浙派成員互動多，評詞時雖不免溢美，但是否僅止於獎掖後輩，又如何解讀其中蘊藏的浙派優劣？就康熙朝文網疏密而言，羅織入獄多出於告發，與抑鬱不遇何干？陳維崧風格也接近蘇、辛，詞論更主張反映現實，生前身後俱未見斥責貶抑。劉萱所論，部分關捩似有可商議之處。⁶

持正面意見者，如盧前（1905-1951）以詞調〈望江南〉論曹溶時，提到「秀水從游

⁴ 此序見張宏生主編：《清詞珍本叢刊》第一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266-267。馮乾所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亦收錄此序，惟少數字詞有具體之別，全文並無分毫之差，見頁279。

⁵ 相關論述分見嚴迪昌：《清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246。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342-343。

⁶ 劉萱：《清初貳臣詞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166-180。

薪火在，浙西宗派此先河」⁷，肯認曹溶對朱彝尊的影響外，也指出浙派之源可追溯至此。但盧前此說缺乏更細緻的論述，很難釐清二者關係。曹秀蘭則試圖藉由曹溶與浙西詞論的關係、曹溶與浙西六家的互動以及對朱彝尊創作的影響，說明反對者僅囿於一鱗半爪，得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結論。若聚焦於曹溶的詞學思想轉變，可知他最初崇尚北宋、貶抑南宋，後來卻逐漸修正為喜好南宋，兼收並蓄陰柔與陽剛兩種審美風格，更以晚年所著〈古今詞話序〉判斷曹溶與浙派以姜、張為首的南宋典雅觀點一致。⁸此外，朱彝尊任曹溶幕客時，風格亦受影響，故《江湖載酒集》有沉雄之態，儘管不能說曹溶的藝術風格完全承接姜、張，但小令多寄贈、游宴、閨怨等閒情之作，品格不俗不豔，確與白石、玉田頗近，而在康熙十八年後，詞風更幾乎完全接近，顯然和浙派所倡如出一轍。最後，更臚列曹溶對李符、李良年等浙西此家詞的讚賞，認為這種現象凸顯曹溶對南、北宋詞的態度和浙派一致，並一定程度影響朱彝尊等人的詞風，被稱為浙派先河當之無愧。⁹

曹秀蘭的判斷在時間性與可比性頗堪商榷。浙西成派的重要關鍵在康熙十八年前後，無論是《浙西六家詞》的刻行或《樂府補題》的詠物慢詞引起輦下諸公風氣一變，當時審美風尚正開始過渡到南宋，若曹溶詞風於其時始有白石、玉田之風，能否算是浙派「先驅」？何況依據行跡，當時拒絕參與博學鴻詞考試，閉戶家居的曹溶根本未參與此番唱和，等同缺席浙派發跡的關鍵。若仔細分析被視為曹溶晚年定論的〈古今詞話序〉，可看出反對雕琢，重視蘇辛與抒發性情，主張言外寄託之意等觀點。至於對浙派詞人的揄揚，則應考慮序跋應酬的特質，重新細讀相關文獻字裡行間之意旨，才能相對客觀地進行判斷。

即使雙方各有立場，討論角度不盡相同，但判定曹溶有實質影響者無疑聲量較大。如饒芷瑄 2019 年在《國變·身分與文化認同：曹溶及其作品研究》¹⁰中指稱曹溶並未實際參與浙派創立過程，只是襄助朱彝尊編纂《詞綜》之圖書，兩造在詞學觀和創作方面仍有差異，故曹溶本身並不屬於浙西詞派。但又同時認為曹溶在浙派形成之前廣泛提攜後進、借出藏書、時相唱和，讓崇尚雅正的理念進一步啟發朱彝尊推尊姜張一路詞風，縱不屬於浙派，也非創始人，卻因啟發浙派詞人而間接促使浙派發揚光大，故推為浙派先河「當為允論」。

假設二者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對浙派的影響又確實只是間接，那麼朱彝尊為何要標

⁷ 盧前：《飲虹簃論清詞百家》，收入陳乃乾輯：《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冊10附錄，頁1。

⁸ 曹溶：〈古今詞話序〉，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729。

⁹ 曹秀蘭：《曹溶詞研究》，頁175-219。

¹⁰ 參饒芷瑄：《國變·身分與文化認同：曹溶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9年），頁272-275。

舉曹溶，背後是否有其良苦用心呢？抑或〈靜惕堂詞序〉只是陳述自身學詞歷程受到的影響，不必連結至浙派創建？這或許可以回到清初詞壇對詞體認知的背景進行思考。尤其當曹溶的詞學觀點與浙派以清空騷雅為主的說法明顯有異，朱彝尊依舊願意將之尊為浙派先河，顯然不純然著眼於詞學與實踐的趨同，而是特別凸顯某部分來作為自身論述的依據。

三、清初詞壇的詞體認知與曹、朱二人之差異

曹溶卒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靜惕堂詞》則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曹溶外孫朱丕戴刻行，朱彝尊撰序之際，距京師興起《樂府補題》唱和風潮已逾三十年，浙派也在汪森（1653-1726）等人的推波助瀾下成為詞壇主流，然而此一追認恐怕不符合實際狀況。儘管必須承認，從交遊關係可知朱彝尊先後隨曹溶赴任廣東、陝西等地，並被聘為幕客，在公務之餘的酒筵歌席間，二人曾以小令慢詞相倡和。¹¹簡言之，對壯年始倚聲填詞的朱彝尊而言，曹溶無疑為其人之蒙師。是以朱彝尊序李符（1639-1689）所撰之《耒邊詞》時，曾言「逮予客大同，與曹使君秋岳相倡和。其後所作日多，謬為四方所許。」¹²該時期的作品後於康熙九年（1670）編訂為《江湖載酒集》，由此可略窺朱彝尊早期詞作風格。李符〈江湖載酒集序〉以為：

竹垞自題其集曰江湖載酒，取杜牧感舊之句，以自況其生平也。集中雖多豔曲，然皆一歸雅正，不若屯田《樂章》徒以香澤為工者。從來托旨遙深，非假閨閣裙裾，不足以寫我情懷。〈高唐〉、〈洛神〉婉而多風，亦何傷於文人之筆，而況於調乎？¹³

「雅正」是相對於徒以香澤為工的「豔曲」，旨在寄託與個人情懷的展現，甚至可謂比擬婉而多風（諷）的騷人傳統。李符為浙西六家之一，序文評斷應有相當可信度。其中尤值得注意者，朱彝尊此集乃自況生平，自然別有家國寄託。從形式面觀察，朱彝尊這時期的詞風仍崇尚《花間》、《草堂》一脈自晚唐、北宋偏重綺靡婉約的風格。評語特別拈出寄託與雅正，正是為了和作品形貌近似的柳永詞加以區別。不過，即使朱彝尊在〈解佩令·

¹¹ 朱彝尊南遊嶺表，北出雲朔的經歷，參王利民：《博大之宗——朱彝尊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5-43、86-98。

¹²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頁172。

¹³ 馮乾：《清詞序跋彙編》，頁132。

自題詞集〉曾說自己當時的師法對象不是秦七、黃九，仍有不少豔曲之作。行輩稍次於朱氏的徐鉉（1636-1708）便說朱彝尊「填詞與柳七、黃九爭勝」，據此反思《詞綜·凡例》引法秀道人對黃庭堅作豔詞當下泥犁的說法，可見從《江湖載酒集》到〈靜惕堂詞序〉的撰寫時間，朱彝尊對詞體的認知或許沒有明顯差異，但填詞的基本方向已有不少變化。康熙三十五年後才進入京師的焦袁熹（1661-1736），更直截點出朱彝尊「前身歐九，本師柳七，付歌喉、渾無生澀。團扇鍾情，也則是、三生結習」¹⁴，將詞史普遍認為鄙俗豔麗的柳永視為朱氏取法典範，不難想見此一評價在當時不是個別見解，而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如此，則曹溶對朱彝尊的主要影響當非推廣姜、張詞風，朱彝尊的取範對象在浙派成立前後，容有不同判斷。

詞史對浙派宗南宋姜、張的主張早有定見，曹溶本身對詞體典範的認知卻以五代北宋為主，符合清初詞壇的主流認知。以下我們可從〈靜惕堂詞序〉對曹溶「崇爾雅」、「斥淫哇」、「宣昭六義」、「鼓吹元音」的詞體觀去思考二人之關係。以下將先藉由清初詞壇的主流觀點與曹溶的詞體認知出發，接著進一步分析浙派與曹溶說法之差異。

（一）晚明清初詞壇主流與曹溶之詞體觀

晚明清初詞壇主流風氣雖然以《草堂》、《花間》詞風為主，不過雲間詞派宗主陳子龍（1608-1647）卻認為言情之作應有寄託美刺，方不違背大雅之旨。他在〈三子詩餘序〉指出：

詩與樂府同源，而其既也每迭為盛衰。艷辭麗曲，莫盛於梁陳之季，而古詩遂亡。詩餘始於唐末，而婉暢穠逸，極於北宋。然斯時也，並律詩亦亡。是則詩餘者，匪獨莊士之所當疾，抑亦風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廢者，夫風騷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託於閨襜之際。代有新聲，而想窮擬議。……婉弱倩艷，俊辭絡繹，纏綿猗娜，逸態橫生，真宋人之流亞也。或曰：「是無傷於大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吳鹽，美成所以被貶；瓊樓玉宇，子瞻遂稱愛君。端人麗而不淫，荒才刺而實諛，其旨殊也。¹⁵

¹⁴ 徐鉉語見《詞苑叢談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刷），頁531。焦袁熹詞見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18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0601。事實上，與朱彝尊相識於京城的高士奇，在《蔬香詞·滿江紅》也描述朱彝尊「豔句魂消隋苑柳，俠腸酒醉秦淮月。像旗亭、暗睹唱新詞，人稱絕。」這些說法幾乎都能直接聯繫到柳永，即使放寬標準，至少也屬北宋風味，無涉浙派所論典雅之藩籬。

¹⁵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5。

為《幽蘭草》這部收錄自己與李雯、宋徵輿的詞作合集寫序時，他對晚唐至南宋階段，詞體之風格與規範標準，也有理路清晰的發揮：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纖婉麗，極哀豔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繇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為最盛也。南渡以還，此聲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儻武，諧俗者鄙淺而入於優伶。

16

從上述說法可知「崇雅正」與「去淫哇」此組概念，並非源自朱彝尊眼中的曹溶。以儒家雅正觀作為文學規範的操作其來有自，陳子龍對豔詞繁聲的論述足見復古儒家詩學的痕跡。陳子龍將主體情志刻意聯繫至政治現實，判定風騷之旨何妨託於閨幃，進而鬆動詞體哀豔婉麗、窮其盼倩的情貌格調，將情景、辭意的發動視為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舉。如此，則起心動念皆切合節度，得其中和。畢竟性情與道德修養的存乎中而形諸外，無法憑藉修飾達成，故「元音」僅能出於天機偶然湊泊，難以力強而致。加上陳子龍主張北宋詞以高渾勝，不像南宋詞雕琢過於用力而缺乏蘊藉，是以南渡後的詞作缺乏「元音」。

曹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為沈雄《今古詞話》作序時已是晚年¹⁷，但詞學觀仍與明末清初的陳子龍高度相似，有別於浙派立宗後所論，其文云：

填詞於摘文最為末藝，而染翰若有神工。蓋以偷聲減字，惟摭流景於目前，而換羽移宮，不留妙理於言外。雖極天分之殊優，加人工之雅縟，究非當行種草，本色真乘也。所貴旨取花明，語能蟬蛻，議論便入鬼趣，淹博終成骨董。在儷玉駢金者，向稱笨伯。而矜蟲鬪鶴者，未免儻父。用寫曲衷，亟參活句。有若國色天香，生機欲躍。如彼山光潭影，深造匪艱。務令味之者一唱三嘆，聆之者動魄驚心。所云意致相詭，無理入妙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句。其有造語過壯，則與情相戾。辯言過理，又與景相違。剽擬者靡而短於思，臆創者俳而淺於法。剪採雜而顛古者卑之，操作易而深研者病之。即工力悉敵，意態紛陳，要皆糠粃，墮彼雲霧。……然肇自李唐趙宋，迄於勝國熙朝。辨及九宮四聲，斷自連章隻字。所賴集諸家而為大晟，

¹⁶ 陳子龍二序分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5-6。

¹⁷ 曹溶序文提到「歲在乙丑，余來金閩，偶僧沈子出示詞話」，乙丑為康熙廿四年，曹溶於是年辭世，當可將此序作為他的晚年定論。參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729。

規摹亦可盡變。綜前說而出新編，穿貫即為知音也。……上不牽累唐詩，下不濫侵元曲者，詞之正位也。豪曠不冒蘇辛，穢褻不落周柳者，詞之大家。間奉以玉律金科，識法者因之滋懼。即過為標新領異，宏材者抑而就裁。庶倚聲有托，會意靡涯矣。亦思捨筏固是良箴，效顰未免私議。彼放筆類唐伸紙敏給者，俱不足以當黃絹幼婦之稱者也。¹⁸

此說頗與朱彝尊持論相悖。如浙派擅長體物寫景、講求音律，不談言外寄託，強調雕琢字句，而曹溶認為填詞若僅以此為本，「究非當行種草，本色真乘也。」他偏好的是妙語蟬蛻，情衷訴於言外，足以令人反覆玩味之作，而非人工雅縟、淹博逞才的死句之法。「在儷玉駢金者，向稱笨伯。而矜蟲鬪鶴者，未免僞父」，二語尤其激切。《樂府補題》唱和時，曹溶歸里閉戶，未曾參與，但撰寫此序時，似乎隱隱窺知浙派宗風將席捲天下，其勢或無人可與抗衡。

其實康熙十八年，朱彝尊進京赴博學鴻詞科之際，京師詞壇的主流實以北宋為主。如「於詞尤服膺倦圃」的顧貞觀（1637-1714）在〈與栩園論詞書〉提到清初詞壇如何著重寄託以及對吳越一帶競起詞人的評價：

自國初輦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為詣暢。香嚴、倦圃，領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并與燕游之席，各傳酬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¹⁹

曹溶與龔鼎孳（1616-1673）皆為京華詞壇的領袖人物，對當時唱和風氣有推波助瀾之功。但微有寄託或務為詣暢，都迥然不類浙派清空之旨。即使吳越（浙派）填詞者在燕游之席習慣傳唱酬和之篇，卻妍媸雜陳。從行文來看，顧貞觀對浙派填詞風格的評價，並不那麼正面。與浙派相比，納蘭性德（1655-1685）與顧氏的主張無疑更接近曹溶的詞體觀。可惜顧貞觀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致仕，隔年納蘭性德又與世長辭，與浙派論詞意見相左者一時俱空，無人延續推舉詞應有寄託而不該偏重雕金綴玉之形式，於是往姜、張詞風靠攏的浙西詞派，崛起遂成必然之勢。當朱彝尊不去說明清空騷雅與元音、六義的距離，甚

¹⁸ 曹溶：〈古今詞話序〉，頁 729。

¹⁹ 〈與栩園論詞書〉引自馮統一、趙秀亭箋校：《飲水詞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509。

至因為政治因素而避談寄託，與曹溶的詞體認知差異也就愈發遙遠。

曹秀蘭曾以《詞源》之詞學主張和〈古今詞話序〉進行比對，認為二者極為相似，故推導出曹溶對典雅詞派論述的認同與接受與浙西詞派觀點一致。甚至舉曹溶認為李天馥能兼兩宋之長，此一態度是修正從前取法北宋、抨擊南宋之說。然而細辨他所謂南、北宋的代表風格是「纖豔似淮海，沉雄似東坡」，顯然無涉南宋，且題詞多半正面頌美，若以此判定曹溶私心認可，不啻為刻意誤讀，故曹說容有再議處。即使臚列資料廣泛，但如未注意朱彝尊的說法和張炎《詞源》重視言外之意與不蹈前人語意的說法已有明顯差異，以此肯定曹溶與浙派同樣取徑南宋張炎故一脈相承，論證性不夠周延。²⁰

在浙派奠定法姜張、尊南宋的論詞宗旨前，朱彝尊也曾提出兼攝南、北宋的說法。但從結果來看，朱彝尊終究與陳子龍、曹溶、顧貞觀等明末清初以北宋為典範的詞壇主流徹底分道揚鑣，甚至認為詞體之工者，多為歡愉之詞，故詞應發揮歌詠太平之樂與山林友朋之娛的功能，不宜反映個人困頓與家國興衰。²¹

若曹溶在浙派成立過程的貢獻之一是提供大量南宋遺集，是否暗示北宋詞集不在考量範圍內？抑或北宋詞風在清初詞壇本即主流，無需特別強調？事實上，徐乾學（1631-1694）、汪森等人均提供《詞綜》之編選材料，特別標舉曹溶無疑可以將他從推崇北宋詞的陣營拉往取法南宋的浙派。以下，筆者將進一步梳理曹溶與浙西詞派觀點的差異，並分辨朱彝尊在〈靜惕堂詞序〉將開風氣之先的冠冕給予曹溶的說法。

（二）曹溶與浙西詞派之觀點差異

朱彝尊在〈魚計莊詞序〉²²回憶初入京師的場景，曾曰：「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又說「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年以來，其年、容若、晏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者之專且勤矣。」²³這裡所謂浙派的詞體觀，顯然不是後來專主南宋的路線，但是朱彝尊卻在序文中將已然辭世的陳維崧、納蘭性德都引為同

²⁰ 曹秀蘭：《曹溶詞研究》，頁 175-178。

²¹ 朱彝尊〈紫雲詞序〉指出「昌黎子曰：『歡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於詞，或不然。大都歡愉之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爾。故詩際兵戈傲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此外，〈樂府補題序〉雖認為系列唱和皆是觀察「宋末隱君子」志意的媒介，卻將「身世之感別有淒然於言外者」與「山林朋友之娛」並列。二序分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240；屈興國、袁李來點校：《朱彝尊詞集·附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401。

²² 詞集作者戴錡之生平不詳，故此序撰寫之確切時間不明，因戴錡為浙江嘉善人，又曾從遊於朱彝尊，推估時間應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後。因該年朱彝尊私帶抄書者入禁中抄錄四方所進圖書被彈劾，隨時返鄉居住，故〈魚計莊詞序〉可能晚於康熙二十一年與陳維崧等人在京師聚會。

²³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340。

道，與當時的詞壇共識和歷史實情並不相符。根據姜宸英（1628-1699）在〈蔣退庵遺稿詞序〉所載，陳維崧、顧貞觀等人在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燈夕的一次聚會曾一起填詞題詠，當時朱彝尊也在場。姜宸英對諸詞人之評點如下：

梁溪以北宋秦、柳為的，陳則頹唐於稼軒，朱則滌洗於白石。譬之韶夏異奏，同歸悅耳，一時詞學之盛，渡越前古矣。²⁴

從上述兩個例子，隱隱可見朱彝尊在序跋文字透顯的訊息說明他在短短幾年間在詞體典範上的轉移，至少在康熙二十一年，姜夔就已經是他心追手摹的典範詞人。但〈魚計莊詞〉又將康熙二十一年後陸續離世的詞人們列為浙派，在策略上與在曹溶往生後撰寫《靜惕堂詞》序文頗有相近之處。加上曹溶康熙二十四年〈今古詞話序〉所論和浙派的觀點頗為不同，似乎朱彝尊有透過撰寫序文試圖拓展浙派影響力及掌握詞壇主導話語權的可能。

畢竟曹溶的詞學觀點偏向主情、重活法、強調一唱三歎，和雲間派陳子龍所論更加貼近。差別在於曹溶能留意詞體歷時性的發展變化，認為「賴集諸家而為大晟，規摹亦可盡變」（曹溶〈古今詞話〉序，見前引文），不似雲間後學專主一家。特別是捨筏遠勝效顰，可謂隱隱針砭獨標南宋姜夔為最善的浙西詞派。此外，曹溶指出詞之大家的典範標準是「豪曠不冒蘇辛，穢褻不落周柳者」，此語並未全盤否定豪曠與穢褻，而是以蘇辛、周柳為節度的邊界。四家除辛棄疾外，俱為北宋人，而稼軒詞風的審美趣味迥異典雅一路，與浙派模習對象毫無瓜葛。值得注意的是「冒」、「落」二字所欲表達的是超出理想範圍，而非否定蘇辛、周柳的風格。曹溶本就主張轉益多師，以情志為核心，不著眼於字句，故在〈青城詞題詞〉明白點出：

溫麗者，古人之蘊藉；疏放者，後習之輕佻，非漫以周秦、辛陸論也。先生留心名理，不尚浮華，每於花落酒闌，吐言成妙。本以嘯歌為適，非矜字句之妍。讀者當知先生集聲教之大成，於一唱三嘆之間得之，不可以溫麗、疏放陷之也。²⁵

《青城詞》作者魏學渠（1617-？），為浙江嘉善人，所學以《花間》、《草堂》為主。但從曹溶的說法可知，溫麗、疏放之優劣，關鍵不在取法對象是周秦或辛陸，而是模習者失之輕佻，流於形式。若情志得以透過詞作抒發，便不該片面從風格去判別高下。曹溶並

²⁴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341。

²⁵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268。

未明確點明魏學渠《青城詞》肖似何者，反而從不尚浮華、集聲教之大成的角度出發，顯然與教化、寄託之說相近而與雕琢浮豔有所距離。當內在精神的重要性大於形式，吐言是否天然入妙，不在字句之妍，而是造語不與情相戾，辯言不與景相違。為文造情，缺乏真實感受的文字遊戲（即放筆頹唐、伸紙敏給），何能匹配絕妙好詞四字。

既已釐清曹溶晚年的立場與朱彝尊迥異，那麼「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春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先生」，這句話便該分為兩部分來理解。從朱彝尊的習詞歷程便可發現浙西詞人「數十年」來取法姜、張甚為可疑，風氣之變亦屬刻意追贈的冠冕。朱彝尊何以有此行為，可從以下兩點進行探索，其一，曹溶在北京詞壇為舉足輕重的名家，借勢使力，不啻讓推廣浙派更具方便性。加上朱彝尊將顧貞觀、納蘭性德、陳維崧等立場未必契合浙派論述的詞人列為廣義的「浙派」，甚至積極地藉由撰序表達這樣的觀點，有助於推展浙派勢力；其次，曹溶對南宋詞的負面評價主要在於徒具形式，缺乏寄託之思，不過在朱彝尊筆下，北宋詞的元音和春容大雅似乎可以南宋姜、張一路騷雅詞風若合符節。

其實曹溶評價浙派成員汪森詞作時，依舊將詞體之春容大雅和興盛歸諸北宋，反對雕繪之風：

詩餘起於唐人而盛於北宋。諸名家皆以春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於詩，輕俗不流於曲。此填詞之祖也。南渡之後，漸事雕繪，元明以來，競工俚鄙，故雖高、楊諸名手為之而亦間墜時趨。至今日而海內諸君子，闡秦、柳之宗風，發晏、歐之光艷，詞學號稱絕勝矣。晉賢宿擅時名，學殖富而才思宏，其《月河》、《桐扣》諸詞，皆步武北朝，不墜南渡後習氣。而《詞綜》一選，膾炙人口，允足鼓吹騷壇，笙簧藝苑。²⁶

斟酌此段文字，固知對《詞綜》之流程度與對填詞風氣的正面助益，但刻意點出汪森詞步武北宋，易令人產生錯覺，誤以為《詞綜》足以鼓吹騷壇者，在於所選的北宋詞。究其實，「春容大雅」四字最初應和南渡以後詞習氣無關，更不可能助長「家白石而戶玉田」的風氣。

朱彝尊的論述雖可見對抗俗豔詞風的良苦用心，但不可否認曹溶的主要觀點與浙派核

²⁶ 曹溶對汪森《碧巢詞》之評語，可參清代聶先與曾王孫所輯：《名家詞鈔評》，收入朱崇才編纂：《詞話叢編續編》，第二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686-687。朱崇才所纂《續編》首句本為「詩餘起於唐人而勝於北宋」，但推敲文義，當為「盛於北宋」，故引文所陳乃筆者遷改，特說明之。

心說法大相逕庭。或許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曹溶對浙派成員的實際批評去思考他贊同的是甚麼，當有助於我們梳理雙方論點之分合。

四、從具體批評觀察曹溶與浙派之分合

曹溶崇尚自然天真、標舉性靈，重視言外之意的核心觀念以及對詞體的理想規範，整體與北宋詞契合度較高。至若浙派所標榜的清空騷雅，僅為南宋諸多詞風之一，兼攝南北宋的說法應可反思。尤其在朱彝尊力倡浙派宗風後，南宋詞的多樣性被單一面向所取代，甚至所謂南宋習氣逐漸限縮為「詞莫善於姜夔，又以南宋極其工」。此說無疑矯枉過正。從歷史情境可知，江湖詞人確實可能不慕榮利，然而遊走四方以謀生計者，為文不免逞才使氣，文字顯得抽離現實而流於輕薄虛浮，雖能不受政治侵軋，但仍缺乏傳統士大夫承擔重量的襟懷與勇氣。曹溶作為政治上的貳臣，受乾隆以降負面評價的影響，鮮有人在意他受儒家經世思想影響而出仕的那面。儘管他有心濟民，在順治朝卻屢遭踣躓，康熙十七年受薦博學鴻詞科考試而未就，此一潛在本質與際遇，讓曹溶對詞體的認知注定不可能強調格律聲色等形式面。以下我們可以依序觀察曹溶如何評價非浙派詞人的顧貞觀與趙吉士、浙派詞人龔翔麟（1658-1733）、李符，乃至聽聞吳綺（1619-1694）推薦風格近乎浙派的高層雲（1634-1690）、丁焯（1627-1696），或許可以更進一步看出曹溶與浙派的分合。

（一）曹溶對顧貞觀詞的評價

從曹溶對顧貞觀、趙吉士（1628-1706）二人詞集所提出的隻字片語，約略可見他對詞體的認知較為傳統：以「作者主體」為本位，將精神氣質與內在修養置諸形式審美之上，強調詞體應有言外意，寧可彰顯纏綿悱惻的情感厚度，也勿因尖刻而自矜自喜：

彈指早負盛名，而神姿清澈，儼如瓊林琪樹，故其填詞纏綿惻惋，恍聽坡公柳綿句，那得不使朝雲聲咽。讀《彈指詞》，有凌雲駕虹之勢，無鏤冰剪彩之痕。（〈彈指詞題詞〉）

詩尚沉雄，忌纖靡，詞喜清婉，戒浮膩，昔人言之詳矣。不知清婉之變，其流而下也，勢若江湖然，浸浸乎幾不可挽矣。先生詩詞等身，能使輕婉入妙，究不落尖刻

一路。(〈萬青詞題詞〉)²⁷

從顧貞觀的「神姿清澈」直接聯繫到詞作的「纏綿側惋」，背後的批評邏輯潛藏著形諸內而發諸外，人如其詞的概念。曹溶以此相比北宋蘇軾之妾朝雲歌〈蝶戀花〉而淚下，幽恍難言的情緒透過牆裡牆外、燕飛絮落的景色轉換呈現，無典實，不滯重，卻讓聞者徘徊於多情、無情間忖思自度。「冰鏤剪彩」雖云絢麗多彩，但難免生硬乏氣，二者之潛在對立可以想見。曹溶論詞主張前後頗為一致，對清婉容易流於尖刻的典雅詞取徑，實屬皮裡陽秋。²⁸

顧貞觀少游京師，以才名受知而任秘書監典籍，康熙十年（1671）曾落職南歸，十一年中舉而官中書舍人，後結識納蘭性德。二人因性情與論詞取徑頗為接近，遂結成莫逆。納蘭性德重視性情與寄託，反對尖新巧技，²⁹詞之體製中尤工小令，這些觀念都與顧貞觀如出一轍。雖無直接證據顯示顧貞觀詞學必然上承曹溶，但「於詞尤服膺倦圃」的說服力，顯然比後來朱彝尊的追認更接近當時以北宋詞為尚的京師詞壇風氣。重視纏綿側惋，情感真摯不假雕鏤，大抵與曹溶所論互為表裡。

若首則題詞還無法明確看出曹溶內心的典範為北宋詞（或蘇軾），第二則無疑能清楚看出曹溶認為詞體若往不好的方向靠攏，恐怕不能說是「變而趨工」。「江湖」固然可指為水勢趨下的自然現象，但同時亦可代稱南宋自姜夔以降，許多轉徙江湖而困於生計的清客，他們藉由文字作為謀生媒介，自然必須於此下功夫，鑽研愈深，距離真情實意愈遠。此處以趙吉士為例，特別耐人尋味。趙氏原籍安徽休寧，後入籍杭州，而杭州是姜夔一生

²⁷ 二序詳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分見頁292、365。

²⁸ 乾嘉時期的孫爾準身處浙派極盛而常派將興之際，其所撰〈論詞絕句〉指出「笛家南渡慢詞工，靜志題評語最公。不分梁汾誇小令，一生周柳擅家風。」顯然顧貞觀與浙派在推崇朝代與理想典範上的差異。孫詩見王偉勇編著：《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161。此外，彝尊先對〈彈指詞〉也曾有過以下評價：「考聲選調，吐華振響，浸浸乎薄辛蘇而駕周秦矣。」主要參照對象仍是北宋詞人。見清彝尊、曾王孫輯：《名家詞鈔評》，收入朱崇才編纂：《詞話叢編續編》，頁659。

²⁹ 況周頤對此論之最明，其言曰：「納蘭容若為國初第一詞手。其《飲水詩·填詞古體》云：「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記。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冬郎一生極顛顛。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鞋心事杜陵知。祇今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慨自容若而後，數十年間，詞格愈趨愈下。東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語清空，而所得者薄。力求新艷，而其病也尖。」見況周頤著，孫克強輯考：《蕙風詞話·廣蕙風詞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93-94。納蘭性德以貴公子之姿，卻不認同詞以歡愉為工，顯然對詞體本質的認知，與朱彝尊持論有別。朱氏所撰納蘭性德祭文，雖稱自身詞作「剪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為絕倒，百過誦之」，又說二人「領契披襟，數文折理。若苔在岑，若蘭在沚」，但仍不得不指出「花間草堂，淶水之亭」，顯然各自宗尚異調。參黃曙輝、印曉峰點校：《通志堂集（修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378-379。

居住最久之地，也是浙詞重要淵藪。但趙氏填詞能清婉入妙，不落尖刻露才，蓋以二人出處、襟懷不同。學姜者若無相應骨氣，典麗纖巧也可能淪為文字遊戲。從中，我們已能約略看出曹溶的批判重點。

（二）曹溶對浙派龔翔麟、李符詞的評價

從交遊網絡來看，曹溶確實與許多浙派詞人互動頻密，然而互動與實質發揮影響仍有一段距離。即使有影響也必須具體考辨其落實層面，不宜遽然以往還行跡判別朱彝尊、二李、二沈以及龔翔麟對南宋詞的理解，導源自曹溶。如陳雪軍以為曹溶與朱彝尊、李良年等浙派詞人之主張未必一致，但不妨礙曹溶成為浙派先河，因為他在浙派形成與發展過程確實發揮極大的作用，故二者之間有著直接關係。³⁰然而，交往與唱和是否等同接受詞學觀，恐怕有待驗證。³¹何況品評浙派成員時，隱隱可見曹溶因不甚認同南宋典雅詞風而又欲說不說的微言大義。

如曹溶〈紅藕莊詞題詞〉便對浙派龔翔麟詞作是否「家白石而戶玉田」，論斷頗堪玩味：

詞家之拈僻調固難，而拈僻調者求為尖新妙麗則更難。讀《紅藕莊詞》，備美角勝，脫灑塵習，駕姜、史而上之，不獨使竹垞、融谷獨擅所長也。³²

曹溶本就對追琢尖刻一路的作品頗有微辭，職此，不妨推測此處所說之「難」，並非能力「不能逮」，而是相異論詞觀點下的「不願力強而致」。在這樣的描述下，龔翔麟詞不局限於拈僻調後積極雕琢文字，反而能夠擺脫前述「塵習」而「備美」，奠基於此，遂有超越浙派諸人延續南宋姜、史一脈典雅詞派所擅長之處，無法單純以浙派藩籬為限。依照慣例，為後生小子作品撰寫序文與題詞時，懷抱鼓勵之長者多半會從正面的角度出發，但曹溶明知龔翔麟習詞過程深受朱彝尊影響，依舊有此「溢美」之詞，暗示姜夔、史達祖皆為可以凌之而上的詞人，言外之旨，頗耐人尋味。

又如名列浙西六家的李符論詞也與朱彝尊不盡相同，當時評價也隨時可見標榜其學北宋而能與李良年（1635-1694）相抗衡的特點。汪琬（1624-1691）在〈耒邊詞序〉指出：

³⁰ 陳雪軍：《梅里詞派研究》，頁 156-158。

³¹ 曹秀蘭也有類似推論，透過曹溶與浙西六家的交往判定前者的詞學觀點影響後者，並發展出崇尚南宋、取法姜張的核心觀點。見《曹溶詞研究》，頁 210-219。

³²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215。

往在都門，與武曾論詞，必以少游、美成為當行家，然竊謂閨閣脂粉氣太勝；如東坡、稼軒所作，雖非詞人本色，然猶不失英雄面目也。四家詞原未可優劣。今讀分虎近製，超然自得，不涉時谿，其原始出坡老。……武曾、分虎之詞，雖其派各異，然不謂之競爽不可也。³³

從序文可知，汪琬曾與被判定為浙派詞人的李良年在北京論詞，按時間推斷，當為康熙十八年汪琬受陳廷敬（1638-1712）等人舉薦博學鴻詞之際。同年詞壇大事尚有龔翔麟在南京合浙西六家詞為一編刊行，學界多半視此為浙西成派的證據。不過，汪琬在序文也提到就作品論之，《未邊》一集更貼近東坡，而這樣的外顯風格，與李良年流派相異。被朱彝尊引為推尊南宋詞之同道的曹貞吉，也表示：

丙辰冬，分虎自南來，見示《未邊》新製，其溫麗者真可分周、柳之席，而入《花間》之室。即間作辛、陸體，而和平大雅，亦不至於鐵將軍銅綽板。余曰：「道在是矣。持此以往，雖上掩昔人可也。」³⁴

丙辰為康熙十五年（1676），時任京官的曹貞吉（1634-1698）與抵京的李符相見，對其詞的評價是溫麗者可與周邦彥、柳永分庭抗禮，顯然上承北宋溫婉綿麗之風；至於豪宕之體，則如南宋辛、陸一脈，指出李符詞大抵和平大雅，未有鏗鏘齟齬之弊。此現象或與李符長期受知曹溶並與之過從甚密有關。朱彝尊對李符不以典雅為宗的現象頗為清楚，卻以頗為含混的說詞帶過：

逮予客大同，與曹使君秋岳相倡和。其後所作日多，謬為四方所許。然自諸子外，鄉黨之論，或不爾也。使君既歸倦圃，李子分虎時時過從，相與論詞。其後分虎游屐所向，南朔萬里，詞帙之富，不減予曩日，殆善學北宋者。頃復示予近稿，亦精研於南宋諸名家。而分虎之詞愈變而極工，方之武曾，無異墳麓之迭和也。³⁵

曹溶於康熙六年自山西大同去官後，便歸返故里不復出仕，這段時間李符與之過從甚密，乃有「善學北宋者」之說。然而，朱彝尊卻也提到李符出示之近稿風格「精研南宋諸名家」，

³³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172-173。

³⁴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173。

³⁵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172。

難以判斷《耒邊詞》付梓前後風格曾有明確變化，但文中並未明言精研哪些南宋名家，恐不宜貿然直指為姜、張。加上師法南宋未必等同摒棄北宋，朱彝尊無疑省略過多細節。當我們輔以汪琬、曹貞吉之言，遲至康熙十八年左右，旁人仍以北宋周、秦、柳諸家詞風看待李符。即使涉及南渡後，也以蘇辛（或辛陸）為旨歸，顯然「變而極工」四字，應是放在南宋詞的整體框架下，而非聚焦於典雅。如此看來，即使並稱浙西六家，李符在創作、理論兩方面似乎很難稱得上是朱彝尊之羽翼。晚清譚瑩的論詞絕句之作說得尤為直露，其詩云：「倦圃人歸有耒邊，朔南萬里倚聲先。反從北宋追南宋，朱十言夸殆未然。」³⁶大抵也無法同意朱彝尊直接將受曹溶尚北宋之說影響甚深的李符，置於浙派取法南宋的陣營。

被視為浙派健將的高層雲³⁷也稱《耒邊詞》「獨露本色，在宋人中絕似竹山」³⁸。竹山指南宋蔣捷，在汪森〈詞綜序〉及朱彝尊〈黑蝶齋詞序〉中皆被納入姜夔一脈的譜系，浙派後繼者或許不假思索依循前說，但籍貫為江蘇宜興的蔣捷，在宋元之際未與臨安詞人群的周密、王沂孫、張炎諸子往來，風格亦自殊異，風格反與陽羨詞派更為接近。³⁹晚清陳廷焯尚未由浙入常前，在《雲韶集》雖亦視李符為浙派中人，卻認為他「疏快處似竹山」。⁴⁰疏快二字，當近蘇辛而遠姜張。

（三）曹溶對被納入浙派之高層雲、丁煒詞的評價

曹溶在〈改蟲齋題詞〉敘述他聽聞吳綺評價高層雲詞風逼似浙派後的反應也耐人尋味：

晤園次於蜀岡之下，因言《改蟲齋詞》逼似竹垞、葆汾一路；閱之，乃上凌夢窗、白石，有非竹垞諸公可以盡其長也。⁴¹

題詞清楚指出從耳聞到親睹過程的落差。儘管吳綺告知高層雲詞風貼近浙派，曹溶實際閱讀後卻得出「上凌夢窗、白石」的結論。回到浙派以南宋姜張為尊的邏輯，吳文英或許可

³⁶ 王偉勇編著：《清代論詞絕句初編》，頁 225。

³⁷ 此為嚴迪昌之說，但嚴氏並未細論高層雲之詞作、詞論與浙派的關係，當有繼續深掘之處。參嚴迪昌：《清詞史》，頁 234。

³⁸ 馮金伯：《詞苑萃編》，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1945。

³⁹ 陽羨派重要人物蔣景祁，為蔣捷之後，嚴迪昌論之甚詳，見《清詞史》，頁 163-165。又嚴氏《陽羨詞派研究》第二章也論及蔣捷對陽羨派的影響，可相互參照，見嚴迪昌著：《陽羨詞派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3 年），頁 50-56。

⁴⁰ 清·陳廷焯著，孫克強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394。

⁴¹ 園次應作蘭次，即吳綺，此當為編輯無心之誤。參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282。

能被超越，但已臻於至善的姜夔顯然是不可比肩的最高標竿。觀察曹溶對高層雲詞的評價，顯然姜夔並非心目中無法超越的至高典範，由此能看出他與浙派的差異。文中出現的蔭次即吳綺，為江都（今揚州）人，曾供職京師，康熙五年（1666）任湖州知府，二十年（1681）還居揚州，復因謀稻梁而客廣州，二十五年（1686）乃以粵中所得，購林地築舍於揚州。⁴²推斷康熙二十四年辭世的曹溶，最有機會與吳綺會於蜀岡的時間當為康熙二十年左右。觀察曹溶刻意將高層雲與浙派譜系拉開距離的做法，可知他晚年依舊不甚肯認時人仿倣模習南宋典雅一派時逐漸走向形式僵化，喪失個我本真的做法。判定高層雲的詞作超越姜夔，並強調「有非竹垞諸公可以盡其長也」，即使未全盤否定南宋典雅詞風，卻無疑鬆動姜夔在浙派的典範地位。

吳綺向曹溶極力推薦者不只高層雲，還有閩籍詞人丁煒。前文曾提及朱彝尊強調詞體之工者多歡愉，此說正是他為丁煒《紫雲詞》撰序時所提出。假設詩詞之別在於詞「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稱丁煒能兼宋元人之長，⁴³有意將丁氏納入宋末元初張炎、王沂孫等典雅詞風的藩籬內。但曹溶評述丁煒詞作時卻僅以「神怡心曠」形容，固然看不出否定取法姜張的典雅詞風，卻也很難說是支持浙派說法。⁴⁴玩味丁氏〈自序〉，可知他非拳拳服膺於浙派的論詞主張：

迨歲戊午，於燕亭交陳子其年，其年曰：「余見子之詩矣，邇者將梓海內佳詞為一集，子之詞未有聞，寧可無以益吾集？」余乃退而肆力譜圖，上下唐宋元明所作，於辛蘇、秦柳、姜史、高吳諸家尤致專心，慮莫有合。復得朱子錫鬯相為磨劘辨緣，訛證離似，始存一二矣。……辛亥，吳子蔭次、陳子緯雲遙來晨夕，尚有花下筵前良辰美景唱酬諸章，外此則皆軍旅山谷、風塵霜雪、與馬舟楫之間，勞者之歌合成此數，正自無幾。北南兩宋，規仿未盡，敢云付諸雪兒，其於歌喉檀板無所於戾也耶？⁴⁵

戊午為康熙十七年（1678），丁煒與陳維崧結識，此後始廣泛模習兩宋詞名家，又以秦柳、辛蘇、姜史、高吳八家最為用心。朱彝尊凸顯丁煒的成就兼宋元人之長，應有意將辛蘇、

⁴² 此參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所列行跡，分見頁732、823、832、848。

⁴³ 朱序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240。

⁴⁴ 〈紫雲詞題詞〉：「蔭次粵遊歸，豔稱雁水新詞開八閩風氣，恨不得賺全璧捧詠之。一葉湖上，飛濤出示手鈔一帙，時方盛暑，科踞梧陰，璧月未沉，銀灣乍瀉，不覺神怡心曠。蔭次之嘆賞，洵然。」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244。

⁴⁵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243。

秦柳等風格摒棄在外。然而丁焯回首詞集內容的編纂，除辛亥（康熙十年）與吳綺、陳緯雲有過友朋唱和之娛外，多半是宦海奔走的感慨，而這些正近乎朱彝尊落拓江湖的風景，絕非宴嬉逸樂所能概括。從生平際遇的共鳴互感推測，曹溶應是對軍旅山谷、風塵霜雪一類直抒胸臆的篇章別有會心。比對可知，曹、朱二人對丁焯詞的理解，幾可謂各執一詞。

細溯從遊曹溶習詞者，多半兼學兩宋而非專主一家。曹溶本身較稱賞的是北宋自然高渾、以情為尚之作，明確批評南宋傾向反對字雕句琢之習氣。如題門人江士式《夢花窗詞》一集時指出：

梅墩從游最久，秉性誠確，良篤行古君子也。讀書之暇，游情翰藻，不特臨池道媚，筆法鍾、王，即填詞餘技，亦必上擬元音，無南宋後習氣。⁴⁶

前文曾梳理曹溶對元音的詮釋接近陳子龍，有別於朱彝尊〈靜惕堂詞序〉所論，可知曹氏之詞體認知以情志為主軸，看重士大夫的胸襟寄託與精神，倚聲不過是讀書之餘的調劑。相較於秉性學養的厚植，填詞確實只算餘技。簡言之，即「游於藝」在志道、據德後自然而成，無須戮力為之，若耽溺形式上的堆砌排比，終將陷入玩物喪志的境地。

當上擬元音和南宋後習氣成為一組相對概念，曹溶拒斥驚駭於外顯形式且缺乏生氣的「南宋」詞風，便不難想見。詞既作為心靈的載體，必須適切表達真情實感，斟酌言意、情景的調配，避免〈古今詞話序〉所謂「造語過壯，則與情相戾。辯言過理，又與景相違」的弊病，才符合詞體應有之規範。

康熙二十年（1681），浙西六家詞已刊行約兩年，浙派逐漸發揮影響力，而曹溶在一封寫給李符的信中稱許六家詞「吐豔生香，直入南宋堂奧，不啻視柳七、黃九為土苴」，當屬嘉許後輩之語。此語雖可看出浙派反對豔情與俚俗，但南宋堂奧是否等同姜、張呢？曹溶在《靜惕堂詞》中曾有和韻史達祖〈萬年歡〉之作凡十首，亦合乎論詞書信提到的「不佞近作百餘首，頗覺姜史、辛劉為一器」⁴⁷之語。從「六家詞」之稱可知此封書信作於康熙十八年後。曹秀蘭因曹溶非常贊同辛棄疾與劉過，故判定姜史、辛劉為一器之說可看出推崇南宋詞的詞學思想。⁴⁸但必須思考的是，吐豔生香通常用以形容北宋詞，而浙派視柳七、黃九為土苴，乃出於反對《草堂詩餘》的俗豔，能否據此導出曹溶崇尚南宋詞，恐有待商榷。且取法南宋，聚焦在姜史或辛劉顯然意義不同。此外，無論姜史或辛劉，不同的

⁴⁶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318。

⁴⁷ 此處援引資料，為學友逢甲中文系助理教授梁雅英協助取得。此札題為〈與某〉，出自胡泰選輯：《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牘》（天津圖書館藏雍正含暉閣刊本），卷上，頁96。

⁴⁸ 曹秀蘭：《曹溶詞研究》，頁214-215。

遣詞用字與擇調，最終都必須配合創作者主題情性的抒發。簡言之，相異風格呈現的是「器」，情思才是承載的內容物，在此前提下區分當學姜史或辛劉始可謂之當行，甚至區分南、北宋詞何者至善至工，皆屬徒勞。正如〈古今詞話序〉指出的「用寫曲衷，亟參活句」，才是本色真乘。

五、曹溶與朱彝尊對「南宋」詞風的實踐

詞為音樂文學，擇調也會影響風格，〈摸魚兒〉、〈念奴嬌〉、〈萬年歡〉皆是曹溶使用超過十次的詞牌，⁴⁹其中〈萬年歡〉皆為次韻史達祖同調之作。和韻效體向來是考察接受史的重要材料之一，次韻難度又比用韻為高，曹溶捨浙派典範詞人姜夔而追步史達祖，正可作為實踐、詮釋「姜史、辛劉為一器」的觀察點。

次韻方式唱和〈萬年歡〉，雖有逞才使學的傾向，卻不表示曹溶的理論與實踐有強烈落差。擇體選調，關乎所欲表達的內容，用詞未必雕飾，風格無須清空。細讀詞作，應能看出曹溶對南宋詞的偏好取向迥異凸顯詠物、善於形容的浙派。事實上，朱彝尊早期作品也不乏慷慨激昂之作，然而浙派成立後推崇的南宋宗風卻稍涉餽釘，以下分論之。

（一）曹溶對史達祖〈萬年歡〉詞的擬和

曹溶對兩宋詞人均有擬和，蘇軾、賀鑄屬北宋、辛棄疾、張炎則屬南宋，對單一詞人和韻數量最多者，卻是史達祖，且詞牌皆為「萬年歡」，頗耐人尋味。此詞調之共同唱和者為唐夢賚，透過和作對原作詞意的探索與轉化、唱和者的心境與互動兩個角度著手，或可管窺曹溶側重之處。

史達祖原題為春思，乃述女子傷別的代言之作，從眼前景物思昔日舊事，詞中如「芳音」、「厚情易歇」、「離別」、「驚心」等字眼，都圍繞此核心鋪敘。雖未若〈雙雙燕〉、〈綺羅香〉受人矚目，在命意鋪排與遣詞行文上仍屬典型的詠物詞。從題目來看，曹溶所撰則多為贈答、感懷、與友偕遊互動等內容，茲臚列十闋之題目如右：〈唐濟武太史過訪耕石齋小寓，次史邦卿舊韻〉、〈濟武命飲白鹿泉亭，再疊前韻〉、〈濟武同諸子過周雨文山房〉、〈同楊香山、周雨文夜坐〉、〈濟武席上聞歌〉、〈答星期〉、〈同濟武、香巖、雨文、星期雪中飲，是夕沈生度曲，程生鼓琴〉、〈和濟武感懷〉、〈答于畏之〉、〈答曾青藜，兼留別雨

⁴⁹ 統計數據參翁榕翎：《曹溶〈靜惕堂詞〉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43。

文諸子)。⁵⁰除韻腳猶見原作殘存的痕跡外，內容與風格都迥異於史達祖而更傾向抒懷言志。其中又有六首作品提及唐濟武。唐濟武即唐夢賚，曾任官，後因忤上罷歸，胸懷丘壑卻心繫經世之志，將箇中無奈化而為詞，與致仕後歸里的曹溶，心態上極為相近，對政治抱負的無奈，從二人唱和可略窺一斑。

曹溶致仕歸里後，詞作中對卿相封侯、爭名奪利之事顯得頗為冷淡，而以疏狂蕭散之氣質較為凸顯；提及山林、柳巷、湖光山色之美時，饒有興致且別具襟懷。試取三闋，逐次剖析如下：

藥駕蕭寒，鶴巢空、俊人來共烹雪。蠟就東山雙屐，頓教豪發。世界蒼茫未辨，覺此地、亭臯清絕。鑾坡邈、楚調爭彈，好官偏惱狂骨。軍城暮笳漸歇。算青迴陌上，芳草難別。惜取風流，卿相恐是癡物。重約秦樓醕酌，想像裏、蓮花承襪。漏聲促、柳巷旋車，夜深誰餞瑤月。(〈萬年歡·唐濟武太史過訪耕石齋小寓，次史邦卿舊韻〉)⁵¹

上片寫眼前景，開篇破題，點出隱居生活得友人唐夢賚相訪烹茶之樂。蕭寒與空等字眼，看似營造出孤絕清高之感，卻因「共」字，暗示此情景仍有知音烹茶為樂。接著兼用謝安東山屐與阮孚蠟屐之典，一反一正，點染二人不留戀官場並非惺惺作態，實是內心別有所託。正如辛棄疾〈玉蝴蝶·叔高書來戒酒〉所謂「生涯蠟屐，功名破甌，交友搏沙」⁵²。唐夢賚個性正直，曾因糾劾官員而罷歸，曹溶在康熙六年也從大同遭裁缺，二人脾性相近，甚至據此將彼此引為知己。世道蒼茫，卻「覺」此地清絕，彷彿群我關係的對比，蓋心理因素高於現實。鑾坡、楚調皆用典，前者指金鑾殿旁的長坡，代指翰林院；後者則用春秋時期的楚囚鍾儀，言不忘本職者。⁵³過去冀求自己能致君堯舜，故恪守讀書人的職

⁵⁰ 各闋詞題見清·曹溶著：《靜惕堂詞》，收入張宏生主編：《清詞珍本叢刊》第一冊，頁345-351。

⁵¹ 清·曹溶著：《靜惕堂詞》，頁345。

⁵² 宋·辛棄疾著，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臺北：華正書局，2003年2版），頁467。

⁵³ 鑾坡見《石林燕語》所載：「俗稱翰林學士為「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參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卷5，頁9-10。楚調見《春秋經傳集解·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綜合二典之旨，顯然曹溶決心退出政治圈，帶有知識階層有心諷諫卻不受執政者重視的無奈感。參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臺北：新興書局，1981年），頁185。

守，奈何翰林院儘管在空間位置上距離君王很近，但從「邈」字便可知聖聽難以抵達，想仿效彈奏楚調而受晉文公稱許的鍾儀，卻未必可以如願。換片前以「偏惱狂骨」收束，與外在齟齬的骯髒之態不難想見。

下片以暮筵漸歇開端，雖是寫景，但隱藏投閒置散的真正原因，反襯內心衝突未止。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性情難以見容於官場的曹溶，前後以丁憂、染疾為由堅辭不就，對胸懷經濟之志的人來說，致仕歸隱也是一場精神戰爭。此處挪借柳永〈鶴沖天〉「自是白衣卿相」句，延續惜取風流的才子形象，讓廟堂與秦樓成為一組相對意象，意圖同樣昭然若揭。末二韻筆鋒陡然一轉，透過「想像裏」三字憑實化虛，既可說是鋪敘來日之約，也不妨視為重構過往美好。柳巷一般詮釋為煙花之地，呼應重約酌酌之句，然而柳巷同樣是山西地名，屬曹溶昔日任職大同的故地，旋車回駕代表再也回不去了。

未來難期，往日不可追，漏聲轉急天將明，一日匆匆將逝，推移的時間是永恆之敵。發出遲暮之歎的曹溶是否還有用武之地呢？眼下猶有朋輩相伴，若唐夢賚返回山東故里，二人相隔萬里，又有誰能在夜深之際對月坐飲？何夜無月，何夜無酒，但少閒人而已，故上片的豪發之興最後落於蕭瑟。但細辨下片使用的詞彙，芳草蓮花、漏促瑤月皆不稍涉頹唐，然而視覺、聽覺、觸覺的次第運用，竟讓無可奈何之感潛藏在耳目之娛的畫面感後。若依照曹溶自己的說法，這無疑是「以香豔之句，發豪宕之懷」⁵⁴的直接體現，迥異於浙派推崇的風格。

〈萬年歡〉系列之作，除前種風格外，也不乏行文布局與情緒表達較為直截的作品，如〈和濟武感懷〉。該詞為和作，展開討論前，不妨先概述唐夢賚原作內容，以見二者離合。唐氏〈感懷〉上片寫年華漸衰，人間富貴何足憑恃，並援引琴師雍門周透過身後盛衰之語使孟嘗君悲泣難當之典，⁵⁵描述生命充滿各種難以抗逆的不確定感，而收斂於「白楊外、無味青山，何峰可定埋骨」。下片則有意無意間再次強調此身如造化操線控制之傀儡，著眼人間自多別離，最後則以「斜陽好、笑口頻開，離離海嶠生月」一語作結，與起句「顧影崦嵫」相呼應，竟有幾分且珍惜當下短暫美好的強自寬慰感。⁵⁶唐作已隱隱可見蘇辛一

⁵⁴ 雍正合暉閣刊本作〈與某〉，胡泰選輯：《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牘》卷上，頁98。曹秀蘭據康熙本稱此札對象為曹溶門人項嵒雪，但不影響論述內容，姑存之。

⁵⁵ 漢·劉向著：〈善說〉，收入漢·劉向著，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6刷），卷十一，頁279-281。

⁵⁶ 唐詞全篇為「顧影崦嵫，挂紅輪、難消鬢上霜雪。多少朱顏衰老，柳車輕發。爛熳華堂絲竹，算只有、雍門悲絕。白楊外、無味青山，何峰可定埋骨。且支棚場但歇。任僊師跳舞，多分生別。屈指山丘，目下當情無物。今夕銀屏穩臥，那定看、明朝鞋襪。斜陽好、笑口頻開，離離海嶠生月。」見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第9冊，頁4999。

派況味，曹溶如何在史達祖原韻與唐夢賚原作的限制下感懷，所興情緒集中在哪些角度、呈顯何種風格，且看其人之作：

路掃行踪，白漫漫、萬家炊案百名家詞鈔本《寓言集》作「吹」。冷啼雪。頗似哀猿巴水，晝長聲發。布帽橋頭策蹇，正逼出、詩情酸絕。折花罷、幾度凌兢，滑稽應笑波骨。征鏡有時定歇。只蒼生況瘁，焉敢言別。冷炙侯門，方悟錯解齊物。燄燄名場利藪，或不免、口中含韞。何如且、孤嘯繩牀，野鷗同臥黃月。⁵⁷

二詞首句皆以對遼闊空間的回望帶出強烈時間感，但和作側重的並非對年華消逝的歎惋，反而從「個人仕途上的羈旅行役」進行申說。曹溶從遠離宦場的視角回望景色缺乏變化的來時路，愈發勾勒出一片白茫茫而無窮無盡的空寂，將愁思拉得更加綿長。此闋上片「炊」字依案語所據改為「吹」字，則意境之勾勒更佳，將風雪強勁的景況與三峽啼猿相提並論，更見衰颯蕭瑟。

曹溶遭裁缺後曾一度被調派至四川候用，後因丁母憂不出，此哀或與政治昏聩導致他無法施展抱負有關。⁵⁸對照詞境與心境，閉戶讀書，不再出仕的曹溶有別於唐夢賚徘徊夕照晚景，反而聚焦離別與送別之瞬間，巴水的快速流動與策蹇驢的緩慢甚至停滯，使人們在兩個維度間真切逼顯出內心的酸澀——什麼才是「我」作為人對生命不朽的追求？如此寒涼天氣，站在橋頭，手折梅花、蹇驢布帽之形象，「滑稽」二字，顯然有自嘲意味，畢竟水波本該平滑，若非凍餒結冰，焉能見其錚錚之稜骨。上片雖有對人生際遇之悲歎，但同時凸顯了豪邁不屈的姿態。⁵⁹顯然曹詞將主旨定調在回應命運無常、美人遲暮的悲慨。

鏡為古代軍隊收兵所鳴樂器，下片「征鏡定歇」，頗有退轉之意，重新思考在仕途與人生、精神與現實的頹頹周旋中何以自處。一邊是憂心蒼生憔悴，胸懷經濟之志的知識分子不願輕易捨棄天下；一邊是個我受盡官場冷暖，甚至質疑對物我界線的理解。是否該重新回歸自己想要的生活，藉以避免繼續在名利場中奔波？這又可分成兩個層次去探析：我與蒼生同病，豈能真的離開，然而侯門高官思維舉止又與己異調，幾層落差下，似乎歸結於曹溶對「齊物」的理解「有誤／悟」：一旦受名利的桎梏，很難避免「口中含韞」的窘迫，不如權且退隱自適，與野鷗為友，但人們真能與萬物為一嗎？與野鷗為友，是否間接

⁵⁷ 清·曹溶著：《靜惕堂詞》，頁 349-350。

⁵⁸ 參曹秀蘭：〈曹溶年譜簡編及部分詞作編年〉，《曹溶詞研究》附錄一，頁 263。

⁵⁹ 此處關於蹇驢與詩人形象的詮釋，參考鍾曉峰對唐宋騎驢詩人形象與文化傳統的研究成果，詳參氏著：〈文化意象與自我形象——論陸游的騎驢詩〉，《清華學報》，第 45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415-455。

凸顯彼此之間終究有隔呢？這闕詞以文為詞的敘事結構，進退間故作決絕語的心理狀態，無異都趨近於稼軒風味。

退隱與消閑幾乎成為曹溶歸里後倚聲的基調。遭遇性情相投的友朋雖可短暫忘憂，但餞別之際聞歌，仍不免透露青衫失意之態：

百斛明珠，便江南、幾家能繪空雪。逆旅逢君意氣，買舟同發。見許柔情旖旎，笑鐵板、髯蘇粗絕。小紅倚、白石吹簫，西湖堪換枯骨。青萍電光怨歌。捲高臺酒慢，如與春別。調弄英雄，不過旦暮間物。起賦臨風弱絮，彷彿見、江妃綃襪。幽人事、蝦菜猶存，日歸分賦吳月。（〈萬年歡·答曾青藜，兼留別兩文諸子〉）⁶⁰

百斛明珠，應典出唐詩人崔珣〈和人聽歌〉⁶¹末二句：「莫辭更送劉郎酒，百斛明珠異日酬」，未引出的頸聯「一樓春雪和塵落」，正呼應詞作「幾家能繪空雪」，該詩之頷聯提及「尊前旅客淚難收」，則下銜詞作中的「逆旅逢君意氣」。餞別時倚聲作歌相送，明白揭示曹溶不捨留別之意，但值得注意的是，曹溶這裡忽以「髯蘇粗絕」對比「白石吹簫」，應別有所指。蘇軾向被視為豪放詞代表，鐵綽板、銅琵琶乃指風格，相對於執紅牙板的柔情，若稱許旖旎委婉，勢必「笑」蘇詞粗絕。然而這裡的笑當非訕笑、恥笑，而是如東坡所謂「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潛藏自嘲自憐之意。南宋以降，蘇軾便以「忠厚愛君」見知詞壇，明清之際此一形象更加清晰，⁶²其人一生卻屢遭貶謫，東坡之粗，當相對於妙解音律、字雕句琢的姜夔。而提及姜夔處，除與范成大所贈家伎小紅之逸事外，尚有「西湖堪換枯骨」一語。作為上片收束，枯骨二字饒具深意。姜夔終身未仕，困於生計必須四處奔走，晚年則流落江湖，往來蘇、揚間，甚至死後無以為葬，賴友人籌金相助，使勉強埋骨西湖。⁶³然而西湖旁的枯骨又何嘗只有寒士如姜夔者，宋代岳飛、明代于謙，無不長眠與湖光山色之間，仕與隱、愛君與困頓挫折、風流與窮愁潦倒，又豈是寥寥數語便可說盡？

⁶⁰ 或因複印問題，詞作中「旦暮間物」乍看形似「旦暮問物」，覆核格律，應作「間」字。詳清·曹溶著：《靜惕堂詞》，頁350-351。

⁶¹ 曹寅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3刷），卷591，頁6859。

⁶² 審查人建議筆者補上南宋楊湜《今古詞話》便已提及宋高宗稱「蘇軾終是愛君」之語，惟本文欲強調的是明清之際蘇軾愛君形象確實更加頻繁出現。如陳子龍〈三子詩餘序〉說「瓊樓玉宇，子瞻遂稱愛君」，此外汪國粹〈水嬉詞序〉也指出「瓊樓玉宇，都原忠厚之情」；尤侗〈三十二芙蓉詞序〉則指出「世人論詞，輒舉蘇、柳兩家。然大蘇『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嘆為愛君」；丁澎〈棠村詞序〉亦云「昔瓊樓月冷，玉局終為愛君；香徑燕歸，元獻因而薦士」，餘例尚多，此不贅舉。以上序文分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5、106、140、146。

⁶³ 姜夔晚年行跡考述，參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37。

下片筆鋒盪開，以浮萍聚散、電光閃滅為喻，怨歇二字，實點出生命總有諸多不如人意。飲酒也難留春駐，英雄終究敗給時間，江妃意象為求女神話之敷衍，彷彿見其綃襪，無非代指知識分子政治上的失戀。⁶⁴末句再次強調人事幽微難測，轉化張季鷹思念家鄉食物而生歸隱之意的典故。從仕清到閉戶不出，曹溶的際遇有別於九死南荒而不恨的蘇軾，也迥異終身漂浪江湖的姜夔，顯然對官場甘苦深有體會，並藉此做為送別、酬答的結尾。既是自抒胸臆，也不無以過來人的經歷對友朋款款勸戒。

此類深沉情緒與敘述模式，貫穿曹溶多數詞作，也凸顯他認為詞體應表現主體情性的看法。儘管慢詞需要鋪陳，但細觀曹詞可知，形式雕琢往往圍繞言外之寄託，且注重身世際遇，實非山林有朋之娛、歌詠太平所能概括。

（二）朱彝尊對南宋典雅詞的擬和

論及朱彝尊詞風的轉變，多半以《江湖載酒集》與《茶煙閣體物集》分別做為前、後期代表作品。落拓江湖期間，受曹溶啟蒙而填詞，接觸並表現出來的，主要也是傳遞內心對現實的感受。或許擔心同里後輩步入後塵，見識過宦海起伏的曹溶頗為擔憂康熙十八年赴京參加博學鴻詞科的朱彝尊。朱彝尊困頓生計已久，但在幕客時期對詞體的認知卻在酬答唱和中，逐漸從寄託轉向文人案頭唱和之娛，甚至乃趨於雕琢為工，看不出經世濟民的強烈抱負。標舉姜夔等江湖詞人，卻走入廟堂，透過《樂府補題》掀起的唱和熱潮，浙派成員復興南宋以降蔚為風行的詠物詞書寫，書寫內心塊壘的篇章逐漸減少，從性格與經歷觀察，或許不令人意外。對此現象，歷來論者有博學典雅與炫才餽飭的兩極評價，但學者普遍認為浙派開啟以藝術美感的深化為主要目的，缺乏深刻寓意的惡例，相關作品可藉由《茶煙閣體物集》所錄窺其概況。藉此，我們也能窺見朱彝尊對南宋詞風的具體實踐。

《茶煙閣體物集》收詞 114 闋，除唱和《樂府補題》之作以外，題詠物件品項繁多，大宗為花木、禽鳥、瓜果，也包括燈硯等器具及少數題畫詞。其中延續劉過〈沁園春·詠美人〉之作便有十二首，雖語多典雅，不涉粗鄙，儘管取法的是南宋，然非姜夔清空一路。儘管錢芳標受此影響也戲作五首，並以黃庭堅所謂空中語說明歌詠美人身體不過戲作；蔣景祁直言朱彝尊摹畫刻露，卻也舉陶潛〈閑情賦〉為例，指出與他人所撰不同。然而上述開脫之詞，對照朱彝尊對黃庭堅詞俗豔的評價，終究無法完全迴避在擇題與論述的前後不

⁶⁴ 從屈原到曹植，文學作品中追求神女的過程經常被用來比附為君臣關係進行連結加以討論，可參鄭毓瑜：〈美麗的周旋——神女論述與性別演義〉，《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 11-73。以君臣關係解讀〈離騷〉中三次求女的行為者，亦可參康正果：《風騷與豔情》（臺北：秀威資訊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 82。

一。⁶⁵從取法南宋的角度出發，可以發現朱彝尊作品中的「南宋」不只是姜、張典雅詞，即使取法姜、張，似乎亦僅流於形似，特別是「詠物」也集中在物體本身的形貌特質，作者之意隱而不彰，與曹溶的理想標準與創作實踐背道而馳。

朱彝尊自題《江湖載酒集》曾云「倚新聲、玉田差近」，若以《樂府補題》中張炎所撰〈水龍吟·白蓮〉與朱彝尊同調同題之作並置，或可見「差近」處何在：

仙人掌上芙蓉，娟娟猶濕金盤露。輕妝照水，纖裳玉立，飄飄似舞。幾度銷凝，滿湖煙月，一汀鷗鷺。記小舟夜悄，波明香遠，渾不見，花開處。應是浣紗人妬。褪紅衣、被誰輕誤。閒情淡雅，冶容清潤，憑嬌待語。隔浦相逢，偶然傾蓋，似傳心素。怕湘皋珮解，綠雲十里，卷西風去。⁶⁶

綠雲十里吹香，輕紈翦出機中素。銀塘一曲，亭亭何限，露盤冰柱。玉腕徐來，青泥不動，乍鳴柔櫓。任沙鷗撲鹿，雙飛不見，又何況，雙棲鷺。好手畫師難遇。倩崔吳、鼠鬚描取。翠衿小鳥，黃衣釋蝶，添成花譜。雲母屏風，水晶簾額，冷光交處。為秋容太淡，嫣然開到，小虹橋路。⁶⁷

張炎詞作開篇即用金銅仙人承盤典故，令讀者聯想至興亡與身世之感。將白蓮比擬為女子，專注於描寫其姿態容貌，同樣潛藏下片首句運用范蠡、西施在越國稱霸、吳國滅亡後，泛舟五湖，隱居不出的線索。上片止於不見花開處，不見白蓮，即不見比擬為白蓮的女子，眼前已是黑夜，鼻端猶有暗香證明斯人曾真切存在。言外之意，往往在有意無意間，藉由意象的鋪排與敘事的推衍，擴大詮釋的可能性。末二韻出現「隔浦」、「傳心素」、「解珮」等詞語，都有上承屈原以降求女傳統的傾向。求而不得，故「怕」結果終淪為「捲西風去」，呼應花蹤杳然，而箇中旨趣能否準確傳遞，只能期盼偶然相逢的易代知音能否神悟憑嬌待語之言。

⁶⁵ 朱彝尊《茶煙閣體物集》的數量與題材，本文乃據屈興國、袁李來點校之《朱彝尊詞集》，參目錄頁12-16。錢芳標《湘瑟詞》卷一云：「龍洲、清溪，皆有美人諸詠，然秋水春山，金蓮玉笋，猶易著筆；偶見錫鬯詠美人掌、膝、膽、背、乳，可謂思妙入微。因戲拈五調，山谷所云：空中語耳。」此語見清·錢芳標：《錦瑟詞》，收入續修四庫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7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頁25。蔣景祁編纂的《瑤華集》則載曰：「豔情冶思，貴以典雅出之，方不落〈黃鶯〉、〈桂枝〉聲口。如竹垞〈沁園春〉諸作，摹畫刻露，庶幾靖節〈閑情〉之遺，非他家可到。」此語見清·蔣景祁：《刻瑤華集述》，《瑤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7。

⁶⁶ 此據宋·張炎著，吳則虞校輯：《山中白雲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7。部分字句與《知不足齋叢書》本《樂府補題》略有出入，不另出校。

⁶⁷ 清·朱彝尊著，屈興國、袁李來點校：《朱彝尊詞集》，頁224。

除去用韻，朱彝尊以綠雲十里開篇，將張炎原本典故可能涉及的歷史外延聯想，轉化為側重外觀形貌的白描書寫。即使上片透過采蓮女子的棹歌為引，帶出蓮田的自然風光，視角上勉強能算是物、人雙綰。但從下片文字，被詠的白蓮更近乎客觀存在之物，尤其是希望尋覓畫師將此景繪成屏面、簾額的說法，讓活潑靈動之感趨於僵化。因秋容太淺而沿途綻放至小虹橋的描述，實寫，與張炎詞中凸顯白蓮恍若神女、素雅神秘的姿態，更是大相逕庭。簡言之，朱彝尊與浙派的詠物作品，有部分強調堆垛雕琢而為後人所詬病，也有一些較少用典卻難以勾起讀者更深遠的興發感動。在虛實轉換間，曹溶的理論與實踐無疑更重視創作者的主體情性，可以直抒胸臆，也不妨透過故實的敷衍凸出某種情緒、襟懷。

就歷史發展言之，典雅雖為南宋詞甚具代表性的風格，但終究無法涵蓋一個時代的整體面貌。如康熙初年便湧現不少以鼓盪稼軒風氣的大型唱和活動，而最後統攝於以陳維崧為首的陽羨詞派。當曹溶在書信中指出「頗覺姜史、辛劉為一器」⁶⁸，除卻可看出詞體的抒情本質外，還能側面看出浙派論述逐漸盛行之際，以直率吞吐的填詞方式為填詞進路的辛劉，同樣是當時值得取徑的重要典範。只需依照性情取其所需，並無明確優劣之別。朱、陳並稱，各領風騷，當時眾所周知，秀水高佑鉉在〈迦陵詞序〉一方面指出二人旗鼓相當，一方面也提到浙派取法的姜張，「以沖澹秀潔，得詞之中正，至其年先生縱橫變化，無美不臻。銅琶鐵板、殘月曉風，兼長並擅。」⁶⁹無奈陳氏辭世後，景從者缺乏足夠的才力扛起此面大旗。陽羨派後學蔣景祁曾指出兩大詞派宗主謀篇經營的差異：

填詞與詩格等，而歸於工妍，則為論尤嚴。小令約至十數字，長調衍至百十字，結構疎略，字法重見，作者草草，使讀者興味索然。近惟陳檢討其年驚才逸豔，不可以常律拘。而體製精整，必當以白石、玉田諸君子為法，守此格者，則秀水朱日講竹垞耳。⁷⁰

無法以常律拘之云云，非指粗疏豪盪，任意為之而不遵守形式格律，在「歸於工妍、為論尤嚴」的前提下，當詮釋為不因特定風格、家派自我侷限。尤其相較拘守體製，「必」以姜、張為法的朱彝尊來說，能避免尺尺寸寸而揮灑自如的陳維崧，自然更放得開。事實上，曹溶曾品評兩人填詞功力難分軒輊：

⁶⁸ 胡泰選輯：《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牘》，卷上，頁 96。

⁶⁹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 88。

⁷⁰ 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頁 663。

其年與錫鬯並負軼世才，同舉博學鴻詞，交叉最深，其為詞亦工力悉敵。《烏絲》、《載酒》，一時未易軒輊也。⁷¹

朱彝尊薦舉博學鴻詞科後，戮力宣揚浙派的審美觀點，透過轟動京城的《樂府補題》唱和推波助瀾，影響力日趨增加。但曹溶稱許的是《江湖載酒集》而非引領一代詞壇風氣的精工雕琢之作，足可驗證典雅一旦淪為形式，便非曹溶所好。陳維崧《烏絲詞》嘗試擴大書寫題材、遣詞造語與風格也更加多元，有別於早期《倚聲初集》中的豔情詞，且漸能不專尚某家習氣而獨抒胸臆，此一諸體兼備的做法顯然更契合曹溶的詞體觀：

其年天才秀挺，作為四六綺嚴，直可凌轢顏、謝，吞吐王、盧。而於詩餘，尤為獨闢蠶叢，自開生面。不惟無體不備，抑且眾妙畢臻。⁷²

儘管陳維崧終以豪宕雄奇的風格廣為人知，但細讀《迦陵詞》，不難發現他對人心、現實的側重實多過於形式技巧。跨越體式規範的限制，每個人天生而成的才性，各有相符應的體格，不可力強而致，且都應獲得給予同等的肯定。職是，則以姜夔為最善的說法，悖於文章體格之不盡，自然也就稍顯狹隘。模習者與取法對象之間，終究須以主體心靈的言志、抒情作為本質。或許正因如此，即使同樣標舉南宋，陳維崧卻能受到曹溶推許。此一論點，其實呼應〈古今詞話序〉所謂「剽擬者靡而短於思，臆創者俳而淺於法。剪採雜而韻古者卑之，操作易而深研者病之。即工力悉敵，意態紛陳，要皆糠粃，墮彼雲霧。」法與思，換句話說即形式與主體情感，二者並非必然抵觸、無法相容，然而若流於剪採雜、操作易，工力也就如同糟粕，直指浙派在形式面容易流於堆垛、鋪排而缺乏深思獨創的弊病。於此，我們仍能舉出曹溶為陳大成《影樹樓詞》撰序的內容以為輔證，側面凸顯重視「我」如何反映自身於現實的存在痕跡，同時強調反對雕琢的審美觀點。即使排除顧貞觀等詞人，陽羨詞派在整體脈絡上或許比浙派更契合曹溶對詞體的認知：

集生詞多得力於迦陵《烏絲》間，省齋、櫟園極嘆賞之。然其渾樸婉轉處，能真吐性靈，不事雕繪，擺脫韁鎖，妙絕古今。於蘇、辛諸家，初無意於規仿，而究其所近，抑亦不讓南宋以上之名手也。⁷³

⁷¹ 馮金伯：《詞苑萃編》卷八〈品藻〉，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942。

⁷²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94。

⁷³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281。

序文的評價奠基在對陳維崧的盛譽上當毫無疑問，而擺脫疆鎖、無意規仿等特點，乃至切近蘇辛諸家而不讓南宋以上之名手，皆與推崇北宋詞之高樸渾厚有關。

六、結語

清代詞派之人際網絡本多地域上的連結，惟讀者必須注意，從地域詞學的角度出發，曹溶與朱彝尊之間的承繼關係究竟有多大層面的影響力。若相關研究過度強調趨同而忽略其中殊異處，便難以更全面彰顯詞史的整體面貌。本文從詞體認知、實際批評與創作實踐三個角度展開論述，發現有無寄託、模習是否流於形式，是導致詞體認知與模習方式分歧的關鍵。浙派所受影響應是填詞風氣的推廣及對南宋詞的留意，並不侷限在清空騷雅的姜、張詞風，故後來「家白石而戶玉田」的盛況主要是朱彝尊之功。加上浙派將詞體視為清娛、賞玩的載體，試圖歌詠太平、反映和諧，曹溶則強調情志向度，將詞體視為承載容器，二者說法有明確分別。

從創作實踐的角度，更可清楚看出二人對「南宋」理解的分歧，背後概念則呼應詞體觀的不同。曹溶注重寄託與真摯情感，注重音律形式與字句雕琢的浙西詞派，則容易給人泯除主體情性的弊端。據此，我們不妨說曹溶反對與憂慮的是浙派流於雕琢字句，易將活法參成死法，導致在模習、取法的過程中喪失主體性。關於情感與形式的呈現，曹溶在〈古今詞話序〉也直截點出法蘇辛者容易流於「造語過壯」、「辯言過理」，因此理想的詞體規範必須在情景、言意之間得到平衡。

浙派成立後，標榜姜夔的朱彝尊確實更凸顯字句雕琢及詠物鋪陳，並屢次強調山林有朋之娛及歌詠太平。這些說法與主張性靈、寄託重於形式風格的曹溶，非但缺乏明確承衍關係，甚至可謂有根本差異，故對曹溶如何引領「風氣之變」，宜有更細緻的分殊。我們雖應稱揚朱彝尊開派浙派時筆路藍縷之功，也當體認他將曹貞吉、納蘭性德等當時京師詞壇著名詞人引為同調是一種操作策略。正如曹溶本是清初京師詞壇領袖人物之一，借其人之口標舉姜、張為典範人物，同時凸顯自身學詞曾受益於曹溶，當有助於推廣浙派主張。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劉向 LIU, XIANG 著，向宗魯 XIANG, ZONG-LU 校證：《說苑校證》*Shuo Yuan Jiao Z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3 年 6 刷）。
- 晉·杜預，DU, YU 著，《春秋經傳集解》*Chun Qiu Jing Zhuan Ji Jie*（臺北 Taipei：新興書局 Xinxing Book Company，1981 年）。
- 宋·辛棄疾 XIN, QI-JI 著，鄧廣銘 DENG, GUANG-MING 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Jia Xuan Ci Bian Nian Jian Zhu Zeng Ding Ben*（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Shuju，2003 年 2 版）。
- 宋·姜夔 JIANG, KUI 著，夏承燾 XIA, CHENG-TAO 箋注：《姜白石詞編年箋注》*Jiang Bai Shi Ci Bian Nian Jian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1 年）。
- 宋·張炎 ZHANG, YAN 著，吳則虞 WU, ZE-YU 校輯：《山中白雲詞》*Shan Zhong Bai Yun C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年）。
- 宋·葉夢得 YE, MENG-DE：《石林燕語》*Shi Lin Yan Yu*（新北 New Taipei City：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1965 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著，屈興國 QU, XING-GUO、袁李來 YUAN, LI-LAI 點校：《朱彝尊詞集》*Zhu Yi Zun Ci Ji*（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7 年）。
- 清·況周頤 KUANG, ZHOU-YI 著，孫克強 SUN, KE-QIANG 輯考：《蕙風詞話·廣蕙風詞話》*Hui Feng Ci Hua Guang Hui Feng Ci Hua*（鄭州 Zhe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ress，2003 年）。
- 清·徐鉉 XU, QIU 著，王百里 WANG, BAI-LI 箋校：《詞苑叢談校箋》*Ci Yuan Cong Tan Jiao Jian*（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2 刷）。
- 清·納蘭性德 NALAN, XING-DE 著，馮統一 FENG, TONG-YI、趙秀亭 ZHOU, XIU-TING 箋校：《飲水詞箋校》*Yin Shui Ci Jian J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5 年）。

- 清·納蘭性德 NALAN, XING-DE 著，黃曙輝 HUANG, SHU-HUI、印曉峰 YIN, XIAO-FENG 點校：《通志堂集（修訂本）》*Tong Zhi Tang Ji Xiu Ding Ben*（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9 年）。
- 清·曹寅 CAO, YIN 等編纂：《全唐詩》*Quan Ta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3 刷）。
- 清·曹溶 CAO, RONG 著：《靜惕堂詞》*Jing Ti Tang Ci*，收入張宏生 ZHANG, HONG-SHENG 主編：《清詞珍本叢刊》*Qing Ci Zhen Ben Cong Kan Di Yi Ce* 第一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2007 年），頁 265-398。
- 清·曹溶 CAO, RONG 著，胡泰 HU, TAI 選輯：《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牘》*Juan Pu Cao Qiu Yue Xian Sheng Chi Du* 天津圖書館藏雍正含暉閣刊本，不著年分）。
- 清·陳廷焯 CHEN, TING-ZHUO 著，孫克強 SUN, KE-QIANG 主編：《白雨齋詞話全編》*Bai Yu Zhai Ci Hua Quan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3 年）。
- 清·錢芳標 QIAN, FANG-BIAO 著，《錦瑟詞》*Jin Se Ci*，收入續修四庫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冊 1725（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2 年）。
- 清·蔣景祁 JIANG, JING-QI 著，《瑤華集》*Yao Hua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2 年）。

近人論著

- 王利民 WANG, LI-MIN：《博大之宗——朱彝尊傳》*Bo Da zhi Zong: Zhu Yi Zun Chuan*（杭州 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 王偉勇 WANG, WEI-YONG 編著：《清代論詞絕句初編》*Qing Dai Lun Ci Jue Ju Chu Bian*（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EZEN COMPANY LTD.，2010 年）。
- 朱崇才 ZHU, CHONG-CAI 編纂：《詞話叢編續編》*Ci Hua Cong Bian Er Bian Xu Bian*（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 李康化 LI, KANG-HUA：《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Ming Qing zhi Ji Jiang Nan Ci Xue Si Xiang Yan Jiu*（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shu Publishing House，2001 年）。
- 卓清芬 ZHUO, QING-FEN：《晚清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Wan Qing Si Da Jia Ci Xue and Ci Zuo Yan Jiu*（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03 年）。DOI:10.6327/NTUPRS-16828461_120。

- 屈興國 QU, XING-GUO :《詞話叢編二編》*Ci Hua Cong Bian Er Bian* (杭州 Hangzhou :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2013 年)。
- 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研究室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FICE OF “QUAN QING CI” AT NANJING UNIVERSITY 編 :《全清詞·順康卷》*Quan Qing Ci Shun Kang Juan*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02 年)。
- 唐圭璋 TANG, GUI-ZHANG :《詞話叢編》*Ci Hua Cong Bian*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05 年 2 版)。
- 翁榕翎 WENG, RONG-LING :《曹溶《靜惕堂詞》研究》*Cao Rong “Jing Ti Tang Ci” Yan Jiu* (臺北 Taipei :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 , 2008 年)。
- 康正果 KANG, ZHANG-GUO :《風騷與豔情》*Feng Sao and Yan Qing* (臺北 Taipei : 秀威資訊出版有限公司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 2016 年)。
- 張宏生 ZHANG, HONG-SHENG 主編 :《清詞珍本叢刊》*Qing Ci Zhen Ben Cong Kan* 第一冊 (南京 Nanjing : 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 2007 年)。
- 張慧劍 ZHANG, HUI-JIAN :《明清江蘇文人年表》*Ming Qing Jiang Su Wen Ren Nian Biao* (北京 Beijing : 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2008 年)。
- 曹秀蘭 CAO, XIU-LAN :《曹溶詞研究》*Cao Rong Ci Yan Jiu* (合肥 Hefei : 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University Press , 2010 年)。
- 陳乃乾 CHEN, NAI-QIAN 輯 :《清名家詞》*Qing Ming Jia C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書店 Shanghai Bookstore , 1982 年)。
- 陳雪軍 CHEN, XUE-JUN :《梅里詞派研究》*Mei Li Ci Pai Yan Jiu*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2009 年)。
- 馮乾 FENG, QIAN 編校 :《清詞序跋彙編》*Qing Ci Xu Ba Hui Bian* (南京 Nanjing : 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 2013 年)。
- 劉萱 LIU, XUAN :《清初貳臣詞人研究》*Qing Chu Er Chen Ci Ren Yan Jiu* (北京 Beijing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2014 年)。
- 鄭毓瑜 ZHENG, YU-YU :《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Xing Bie and Jia Guo: Han Jin Ci Fu de Chu Sao Lun Shu* (臺北 Taipei : 里仁書局 LEEZEN COMPANY LTD. , 2000 年)。
- 盧前 LU, QIAN :《飲虹簃論清詞百家》*Yin Hong Yi Lun Qing Ci Bai Jia* , 收入陳乃乾 CHEN, NAI-QIAN 輯 :《清名家詞》*Qing Ming Jia C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書店 Shanghai Bookstore , 1982 年)。

- 鍾曉峰 ZHONG, XIAO-FENG:〈文化意象與自我形象——論陸游的騎驢詩〉“Wen Hua Yi Xiang and Zi Wo Xing Xiang: Lun Lu-You de Qi Lü Shi”,《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第 45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 頁 415-455。DOI:10.6503/THJCS.2015.45(3).03。
- 嚴迪昌 YAN, DI-CHANG:《陽羨詞派研究》*Yang Xian Ci Pai Yan Ji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Press, 1993 年)。
- 嚴迪昌 YAN, DI-CHANG:《清詞史》*Qing Ci Shi*(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年)。
- 饒芷瑄 RAO, ZHI-XUAN:《國變·身分與文化認同: 曹溶及其作品研究》*Guo Bian Shen Fen and Wen Hua Ren Tong Cao Rong and Qi Zuo Pin Yan Jiu*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Ph.d.tg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9 年) DOI:10.6342/NTU201902592。

A Re-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 Rong and West Zhejiang School of Ci Poetry

XU, JIA-WEI

(Received December 26, 2022 ; Accepted July 20, 2023)

Abstract

The West Zhejiang School was known for its ethereal and elegant style, and learning from Jiang Kui and Zhang Yan. It's also one of the three influential Ci schools in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leader, Zhu Yizun says that Cao Rong is a pioneer to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vic atmosphere to learn from Jiang Yan and Zhang Yan. But, revie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 Rong and West Zhejiang Poetry School members again, they are not exactly in form and style of Ci, including commentary and writing. Especially in elegant Ci of Southern Song. Cao Rong does not like the style of poems headed by Jiang Kui and Zhang Yan, because he believes that words should express emotion, and each person's temperament is different, so it is best to learn from multiple sources. Although Cao Rong exerted influe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Zhu Yizun's study of word style, his view on word style was closer to that of Yangxian Ci School Chen Weisong. To lead the change of literary atmosphere, it should be due to Zhu Yizun's deliberate admiration and misreading.

Keywords : Cao Rong , Zhu Yizun , West Zhejiang Ci School, Form and style of Ci,
Commentary and writing